从“讽刺”到“讽刺”

——《阿Q正传》的文类阅读与观念建构

刘潇雨

内容提要 关于如何看待《阿Q正传》的“讽刺”，普通读者谭国棠、作为年轻编辑的沈雁冰以及作为文坛领袖的周作人给出的迥异评价，不仅呈现了不同身份和阅读能力的读者在解读方式上的分途，更烛照着与通俗文学博弈的新文学力量如何塑造自己的阅读型构，对新的文类观念作概念的辨认与理解的规训。而与此同时，鲁迅对“讽刺小说”的文类更新，以及对《阿Q正传》的自我阐述，又进一步推进关于“讽刺”的再认识。从是否为“讽刺小说”到什么是“讽刺小说”，再到超越文类以“开出反省的道路”,《阿Q正传》的阅读接受背后隐现的是一条更为纵深的新文学读者养成的观念脉络。

关键词 《阿Q正传》；鲁迅；讽刺小说

诚如竹内好所言：“几乎没有哪一部作品像《阿Q正传》这样在各种各样的意义层面上被问题化。”[1]自诞生之日起，围绕这个经典文本的众声喧哗回荡着现代中国文学、政治、文化演进的多重足音。本文尝试将《阿Q正传》“再问题化”，以“读者”为中心问题重释其被阅读、被理解的原初语境。在新文学生产、传播、接受链条中《阿Q正传》有如一面多棱镜，不仅为我们折射出不同身份和阅读能力的读者接受、解读新文学的分途，更折射出新文学在与通俗文学的角力中建构新的文类观念、养成新的读者群体、塑造新的阅读型构的过程。对《阿Q正传》的再问题化，也是一次对新文学发生故事“再历史化”的叙述尝试。

一 从一次“通信”谈起

见于报刊的最初反响来自一位署名“谭国棠”的读者。《小说月报》在沈雁冰（茅盾）1921年主持革新之后，辟有“通信”栏目，区别于“通讯”所载编辑与约稿作者之信件往来，此栏目的在于与一般读者直接对话交流。谭国棠于1922年1月2日投信《小说月报》，这时署名“巴人”的《阿Q正传》在《晨报副镌》上连载不过四期，阿Q刚刚遭遇求爱失败并为此接受惩罚。谭国棠称此作“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因而“算不得完善”。茅盾则在回应中驳斥了谭的评价，称《阿Q正传》“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2]。

对尚在连载的未完成之作，下如此笃定的论断，这态度本身即非寻常。我们有理由相信，与一般的外部读者相较，茅盾此时对《阿Q正传》的这位神秘作者有更多的了解。因为文学研究会的关系，居于上海的茅盾与北方文坛的联系十分密切。虽尚未谋面，但据鲁迅日记记载，1921年4月至12月间两人有数十次通信往还。1922年10月，广东新会的一位读者来信说：“前几月的《晨报副刊》所登的《阿Q正传》确是长篇中的杰作，我很希望著者（听说是鲁迅先生）把它出个单行本，使一般爱好文艺的人容易购阅。”[3]茅盾即在答复中宣传了《呐喊》的出版计划：“鲁迅先生做的小说，听说将由新潮社初版，想来《阿Q正传》也收在里头的。”[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谭国棠以过多运用讽刺手法为由贬低《阿Q正传》，茅盾则断然否定其与

SAPIB.indd 71 2020-2-28 10:32:07

“讽刺小说”的关联，就“讽刺”的价值而言，作为新文学杂志编辑的经验读者茅盾和作为“普通读者”的谭国棠，实则殊途同归，都作出了消极判断。这提醒着我们思考一系列问题：对此二人来说，为什么“讽刺”是一个负面词汇？《阿Q正传》到底是不是“讽刺小说”？新文学关于“讽刺小说”的观念建构是否与此有所关联？

二　消费“讽刺”：前理解中的通俗化读法

近代小说界的言说家们，热衷于类型的划分与命名，虽然这种命名不加节制，失却学理上的意义[5]，但回到历史现场打量，我们仍能感受到，作为一种类型的“讽刺小说”，在晚清以降的文坛确乎据有一席之地。1908年，《安徽白话报》已经出现“讽刺小说”的栏目[6]，同年《申报》以“讽刺小说”之名连载了“泖浦四太郎”所撰《新水浒》。从短篇小说丛书广告可见，“讽刺”与哀情、侦探、历史、寓言、科学、政治等一道组成“小说界之大观”[7]。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以“讽刺”名类的小说，见于文学报刊的数量不可谓不多[8]。此外，“讽世小说”“讽世短篇”“讥刺”“讥讽”“讽刺话”“讽时短篇”之类的称呼亦时有见。及至20世纪40年代，礼拜六派的杂志上仍有以“讽刺小说”命名栏目的创作见刊[9]。

作为一种表现手法，“讽刺”在时局转轨的清末民初之际，其流行并不局限于小说。如果说晚清“小说界革命”希望以蕴蓄新学新知的“新小说”启蒙民智，“为政治变革制造舆论”[10]，在多种艺术表达方式中被运用的“讽刺”手段则体现了政治角力更为灵活的一面。“讽刺画”“讥讽画”“滑稽讽刺等画”在《图画日报》等报刊媒介上蔚为大观。不过在新文化人看来，作为舶来品的讽刺画（Caricature）“乃谓一种寓意之奇异画”[11]，本为改良社会之利器，“宗旨总要含蓄深而寄托远，规劝多而诟骂少”[12]，然而当辛亥的风云时过境迁，近世上海报界用之，下至轻薄俗套。鲁迅曾在《新青年》上连发三文，批评中国讽刺画格调不高，“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13]。而谈及文学的“讽刺”时，报章论断亦与“讽刺画”相类。“鸳鸯蝴蝶派”作者许瘦蝶分析“短篇小说投稿心理”，称有一派为“攻讦派”，“讽刺阴私，针砭政局”[14]；《申报》上另一“游戏文章”调侃“投稿者之快活”，“作讽刺之谐语”[15]。可见不论讽刺画、讽刺文还是讽刺小说，在整体社会文化语境中皆属相对消极的艺术表达，甚至在与“滑稽”连用可资消遣时，亦被视作“滑稽之正者”的附属[16]。

1915年梁启超痛斥“新小说”之流弊：“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皆因“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17]。质言之，“讽刺”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及泛滥结果。同在这一年，教育部发布公文咨禁荒唐小说，称“庸鄙支离诲淫诲盗之作”，“每喜借口于滑稽讽刺针砭社会之名”[18]。虽然被官方禁止其“流风”，但是在写作中运用讽刺技巧的传统却并未由此斩断。不过，这也不能直接说明，为何在早期的读者反馈中《阿Q正传》被目为此种通俗化的“讽刺”。回到小说发表的原初环境：《晨报副镌》的“开心话”栏目，是考察这一问题必要的工作。在“巴人”的《阿Q正传》之前，“开心话”栏目连续出现了六周，刊登过四位作者的文章：

	日期	题名	作者
1	1921年10月16日	葛胡子	止水
2	1921年10月23日	智识即罪恶	风声
3	1921年10月30日	可怜的好文	止水
4	1921年11月6日	假粪制造的研究	犬儒
5	1921年11月20日	雷祖爷欢天喜地	犬儒
6	1921年11月27日	少了一个鬼学博士	大悲
7	1921年12月4日	阿Q正传	巴人

“止水”正是《晨报》主编蒲伯英，“开心话”由他创立，亦多执笔；陈大悲从1919年开始便在《晨副》上发表大量文章，且与同样热心戏剧运动的蒲伯英一同筹备创办人艺戏剧专门学校，被邀来助阵，是很自然的事；以“犬儒”为笔名的夏敬农时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考取了中法大学留学生资格，应正待前往里昂学习物理学；而以“风声”为

SAPIB.indd 72 2020-2-28 10:32:08

名出现的鲁迅文章《智识即罪恶》我们可以与当时的普通读者一样，视为与“巴人”不同的另人所作。虽然坚持每周都有稿件，但除了“犬儒”的可能存疑的自由来稿，以及蒲伯英的亲力亲为之外，“开心话”得以维系显然与内部圈子的人情关系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稿源并不稳定的栏目，1922 年初开始甚至难以为继，偶有零星闪现。

经过鲁迅和孙伏园的自我叙述，我们已经对被传说化的约稿故事耳熟能详。但不论是鲁迅，还是孙伏园，都忽略了第一次的署名“风声”的文章。因而如果只听当事人的历史回溯，我们有可能无法贴切地理解鲁迅自己解释的，第一章“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要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19]。这或许是谦辞，却也不无实际。从两次约稿可见，先有“开心话”的需求，再有《阿 Q 正传》的生产。这个不能颠倒的前后关系，决定了小说的头回亮相。

前六篇“开心话”的话题、风格奠定了读者对这个栏目的阅读期待。六篇都有具体的讽刺对象，有的直接点出，有的虽不指名道姓，但也留有线索供读者索隐。“风声”之文，即是批评 1921 年 5 月 19 日《京报》副刊《青年之友》上北大哲学系学生朱谦之所撰文章宣扬“知识是罪恶”的虚无观点。因而文学青年川岛（章廷谦）等人在读到《阿 Q 正传》的第一章时会认为“考证”具体的讥刺对象是理所应当的工作[20]。（他们解出的戏谑意味也确乎存在，作为“一篇所谓蘑菇文章”，鲁迅未必没有想要在序里“刺”一下的人与事[21]。）对阿 Q 的索隐与考证与其说是好事者的兴趣，不如说是“开心话”栏目所潜在的“阅读成规”使然。另一方面，正如川岛指出的，《晨报副镌》每逢星期天，“内容和平日的副镌有些两样”，“很受当时读者的欢迎”[22]。周作人也解释，之所以有“星期日那一张副刊”，其实是蒲伯英的主意，“要特别编得多样出色，读起来轻松”[23]。因而即使后来鲁迅的写作“渐渐认真”起来，从第二章起孙伏园就将小说移出“开心话”栏，但每周日（或隔周）出现的《阿 Q 正传》连载，实际仍未脱离有着特殊定位的“星期特刊”的阅读语境与读者期待，也即以轻松、滑稽为目的指向的消闲化阅读。

回顾《阿 Q 正传》的创作时，鲁迅强调因怕被“穿凿”而特意用了《百家姓》，却仍无法避免谣言[24]，除了高一涵描述的小说连载之际众人“栗栗危惧”的场景[25]，鲁迅亦提及即便亮明身份后，误解仍未消除：“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止于如此下劣。”[26]

其实鲁迅并非初次面对这种误解。1919 年 4 月《孔乙己》初刊于《新青年》第六卷第四期，他曾在篇末附记一段，称发表的当下“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27]

1919 年 2 月至 3 月间林纾影射新文化人的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发表于上海《新申报》，鲁迅谓“这时候”大概有此所指。但从更大的方面来看，鲁迅所对抗的不是个别误解，而是一段对于“讽刺”文化概念不清，且社会态度趋于一致（“报私仇”“揭阴私”）的消极历史。诚如陈平原所观察到的：“史传传统的强大影响，养成了中国小说读者的‘索隐癖’。蔡元培有一句话很能代表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28]在谴责小说乃至黑幕小说的阅读中，这种索隐考证的风气不断被推波助澜。尽管写作、阅读“黑幕小说”[29]的风气经由官方力量的禁止和新文学阵营的讨伐已被荡涤，然而一旦小说家们在创作中运用了讽刺的表现技巧，便无可奈何地落入被索隐、被考证的命运。诚然读者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小说，但是背后映射的却是整个读者社会的困境——这些身份或隐或现的新文化受众（如果我们笼统地将所有“可能读者”包括在内的话），其阅读心态与接受能力至少慢了半拍，尚未跟上像鲁迅这样走在前面的新文学作者。

三　辨认“讽刺”：五四新文化人的小说观念建构

《阿 Q 正传》连载结束一个月后，周作人在为

SAPIB.indd 73　2020-2-28 10:32:08

《晨报副镌》所撰专栏“自己的园地”中发表同名评论一则[30]。周作人以知情者的姿态点破“巴人”即是“鲁迅”，以“鲁迅”这一已积累相当分量象征资本的名字影响读者对《阿Q正传》的接受态度[31]。另外，此文实与《小说月报》上的通信事件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茅盾不同意谭国棠将《阿Q正传》视作讽刺，而周作人的评论却将之定性为“是一篇讽刺小说”。周作人援引福勒忒《近代小说史论》的观点，指导读者如何在旧有的印象框架中更新思维：讽刺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作品。它的主旨是“憎”，但“在讽刺里的憎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32]。

体裁（文类）作为接受模型，是“期待视野的一个构件”，“作为文学编码、规范集合、游戏规则，告诉读者应该如何读文本，它保证了对文本的理解”[33]。就阐释《阿Q正传》所传递的效果而言，周作人的“策略”不仅承担文学批评的功能，更像是在文学教育课堂里为读者开列一份详尽的知识指南。他在西方文艺的脉络中旁征博引，考订源流，称鲁迅借鉴俄国的果戈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夏目漱石和森鸥外、英国的斯威夫德等人的艺术手法并化为己用，熔铸为独具个人风格的“Satyric satire(山灵的讽刺)”。有学者指出：“周作人在定义鲁迅的写作特质时，除根据他们共同的阅读范围来确定鲁迅所受影响的来源外，主要依据了自己所受的古希腊及英国文学的影响作为参照来对《阿Q正传》进行评价。”[34]以舶来知识塑造新的期待视野，新文学中作为文类的“讽刺小说”在周作人这里有了定性、定义以及习得的模板。

周作人的训导足见功效。曹聚仁就回忆说当邵力子将《晨报副镌》上“巴人”的连载剪给自己看时，“我实在看不懂”，在看了周作人这篇评述后，“才懂得《阿Q正传》”[35]。对于“真的批评家”给予读者的帮助，周作人也有夫子自道：“他的趣味也超越现代而远及未来，所以能够理解同样深广的精神，指示出来，造成新的趣味。”[36]这是第一篇专文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文坛理解鲁迅小说的某种基调，某种“新的趣味”，几有迹可循。茅盾在1923年所作《读〈呐喊〉》一文中已将《孔乙己》称作“短篇讽刺”[37]，1927年写就的《鲁迅论》评《阿Q正传》为“冷静宛妙的讽刺”[38]；郑振铎则称“自鲁迅先生出来后，才第一次用他的笔锋去写几篇‘自古未有’的讽刺小说”[39]。《一般》上一则评论虽然认为《阿Q正传》的意味没有同书中的《故乡》和《社戏》那么“深长”，但也肯定它“固然是一篇很好的讽刺小说”[40]。1935年《论语》所载一篇讨论讽刺小说的文章更援引周氏此文以为理论依据[41]。

然而在借镜西方以建构讽刺小说的文类内涵的同时，周作人有意在此文中和本国文学的讽刺传统作了利落的切割，称“《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如果说此为打破旧有文学体系的“因袭”库存，那么周作人为西方文艺观念与本国原创文学所作观念上的焊接，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一种症候式表达：另造传统以发明“讽刺”的背后，回顾本国的讽刺遗产时仅以“冷嘲”与“热骂”简单对举，古典小说中的讽刺文脉实仍（被刻意地）语焉不详。其实早在1918年，周作人在北大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研究会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并以“中国近来新小说”相较时，已经对“讽刺小说”展开学术讨论：

> 从旧小说出来的讽刺小说，也发达起来。从《官场现形记》起，经过了《怪现状》《老残游记》到现在的《广陵潮》《留东外史》，著作不可谓不多，可只全是一套版。形式结构上，多是冗长散漫，思想上又没有一定的人生观，只是“随意言之”。问他著书本意，不是教训，便是讽刺嘲骂污蔑。讲到底，还只是“戏作者”的态度……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做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讲到。所以做来做去，仍在这旧圈子里转，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坏的就像了《野叟曝言》……[42]

对“戏作者”态度的批评，或可视为1921年周作人为文学研究会所撰宣言的先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43]同为新文学倡导者与国文门的边缘人，周作人与刘半农、胡适三人主持研究所小说科，使小说活跃于大学课堂[44]。刘半农的几次

SAPIB.indd 74 2020-2-28 10:32:09

演说关注通俗小说的经验教训，也稍有涉及讽刺，“鸳鸯蝴蝶派”的出身令其对此有贴己的体认与批评[45]。通览新文化人对于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讨论，内中不乏一种负面的价值判断。1919 年，朱希祖称与西方自然派小说的客观描写相较，“我们中国的小说都含一种讽刺和教训”[46]，亦可视为一证。前文述及，“讽刺”在前理解视野中被目为娱乐消遣或者“揭阴私”的攻击工具，经年层累的阅读习惯与文类习见，似乎难以撬动。而新文学倡导者对中国文学传统中“讽刺小说”的历史梳理与观念建构，正处在与这种社会共识的对话关系之中。

1922 年胡适应申报馆之邀，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立论，把近五十年内的白话小说分作南北两组，称北方的“评话小说”出自《水浒》一脉，是“平民的消闲文学”，南方的“讽刺小说”“著者都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经验的文人”，而且“都是学《儒林外史》的”[47]。以一再标举的白话（“活文学”）/ 文言（“死文学”）之二元对立的进化史观看待文学史，胡适自然对用白话创作的小说竭力推崇[48]，此前他就曾在与陈独秀、钱玄同的讨论中，称“《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49]。学衡派的胡先骕，虽与胡适就白话文言问题有不同意见，也将《镜花缘》《儒林外史》及后来的《官场现形记》《广陵潮》称作“讽刺小说”[50]。不过胡适进一步指出《儒林外史》由于题材的限制，在“第一流小说之中”，“流行最不广”，且“讽刺小说的短处在于太露，太浅薄；专采骂人材料，不加组织，使人看多了觉得可厌”[51]。而与胡适文学观念相距甚远的“鸳鸯蝴蝶派”文人胡惠生，分析“讽刺寓言滑稽”三种小说的不同时，以“借影射事”总结讽刺小说的作用[52]。可见文坛分享着对于《儒林外史》以降“讽刺小说”的一种共识，对于多写儒林生活的所谓“讽刺小说”有着习见的索隐读法。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阿 Q 虽然是个底层农民，但最初大家看待他的方式仍是索隐式的。在答复谭国棠的来信时，茅盾就称阿 Q“代表了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1923 年的《读〈呐喊〉》中他才将这一论断修正为“一切中国人”。并且谭国棠的批评及茅盾的回应表明，重点不仅仅是《阿 Q 正传》在“讽刺”方面表现得“过分”，而是因为在新文化人的价值观念中，古已有之的“讽刺”本就是一种“过分”。谭国棠所感知的讽刺，便是新文化人对传统的文人读法的认定，因此谭的读后感，正是这种历史的遗形物所型塑的期待视野的投射。这也是为什么茅盾在答复中不愿意将《阿 Q 正传》定义为一部“讽刺小说”的原因，他否定的不是匿名作者“巴人”这部连载中的创作，而是作为概念传统的“讽刺小说”。以谭国棠、茅盾、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态度来看，《儒林外史》以降，“讽刺”这一脉的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上并不见得为佳，因此对《儒林外史》的历史评价最为游移和暧昧。20 世纪 30 年代时茅盾曾说：“本国的旧小说中，我喜欢《水浒》和《儒林外史》。这也是最近的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相信旧小说对于我们完全无用。”[53]从不喜欢到喜欢，从不理解到理解，这背后的跨越不仅仅因为时间的更易，更有赖阐释话语与阅读语境的更新。

“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曾如此感慨《儒林外史》的命运：“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54]为叶紫小说作序时的这点闲笔，批评的正是新文学发生期的胡适等人。反观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似隐隐与此时文坛观念构成博弈关系。在北大课堂上传播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17 篇本）中，鲁迅将晚清以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老残游记》等（在周作人、胡适等人的论述中，它们被称作“讽刺小说”）统称为“谴责小说”，“讽刺小说”在此版本中则尚未出现。“谴责小说”的命名为鲁迅所创，这个横空出世的文类词汇，不附着前历史的混乱经验，或许鲁迅的处理也有避开同期学界之意。据私人通信记录，至少在 1922 年 8 月 21 日之前，胡适曾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稿寄与鲁迅阅读[55]。（周作人也追忆自己对《阿 Q 正传》所作评论文章“当时经过鲁迅自己看过”[56]。）而自 1921 年下半年至 1922 年间，鲁迅大幅增补、修订这个油印本讲义，完成了 26 篇版的铅印本，其中将《儒林外史》从“谴责小说”的范畴中抽离出来，单列一类独

SAPIB.indd 75 2020-2-28 10:32:09

立成篇，命名为“清之讽刺小说”，而“谴责小说”的标题也特地标明“清末”[57]。尽管在小说中运用讽刺的情况非自《儒林》始，（“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但《史略》以《儒林外史》为说部中“足称讽刺之书”[58]，这个论断在日后通行的《中国小说史略》（28篇本）中，沿用和保留下来。

以“公心”首肯要旨，以“婉曲”扬其艺术，在古典小说的类型研究里，鲁迅所作的不仅仅是为《儒林外史》正名，而且是为“讽刺”正名，拔升“讽刺小说”的文类价值。如查借用托多洛夫的概念，爬梳本土语境中“讽刺”的文类传统，可以说鲁迅在对“历史性文类”（historical genres）的考释中，辨认出了“理论性文类”（theoretical genres）的典范形态（诚然它也是“历史性”的）。“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学的某些精妙细微之处，西人很可能无法理解，西式的‘文学概论’也无力阐释像《儒林外史》那样‘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小说，就因为‘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很难被西人所激赏。”[59]

经由《史略》的出版与传播，“讽刺小说”的观念更新从鲁迅的大学课堂蔓延至更为广阔的文坛。胡适1922年时还称《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为讽刺小说，到1927年便认为鲁迅另标出“谴责小说”的名目以与“讽刺小说”相区别“是很有见地的”[60]。从历史的后设眼光来看，在很长时间内这似乎已经成为学界公论。以往辨析《中国小说史略》中“讽刺小说”“谴责小说”，多注目于鲁迅在小说类型研究中的创见或缺憾，然而鲁迅对于“讽刺小说”的概念建构，实有与其时学界对话、拨乱之功，这一潜在背景能为我们观照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补充一重历史现场的视景。

四　超越“讽刺”：“开出反省的道路”

虽然是当时可能距离作者最为切近的批评家，虽然告给具体的理解程式以塑造新文学读者的阅读能力，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价却有所保留，他说“这篇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他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显然未视为鲁迅的成熟之作。除了艺术趣味上的参差，对于鲁迅所欲传递的阅读效果，周作人也可能做了离题更远的解释：为反驳谭国棠“讽刺过分”而有伤真实的批评，在文末周作人以自身经验揭示在故乡“亲眼见到这一类角色的模型”。言及此事，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排除对小说讽刺对象的猜测，而周作人对“真实”的辩护落实于文学的现实主义书写，在纸面印刻真实世界的痕迹并由此照亮文学经验的生成，则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要旨之一。只是，对原型的指认会不会构成接受上的另一种封闭？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的阐述未能脱离原有对“讽刺”的理解逻辑。

作为文学史家，鲁迅肯定考证的学术价值：“《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61]，而他将之视为“讽刺小说”的“绝响”[62]，则似乎试图斩断这一“历史性文类”及其读法与当下理解文学的方式的联系，可见他并未将《阿Q正传》视为此种期待视野中的“讽刺小说”，尽管作为一种方法的“讽刺”被他频繁运用于小说与杂文写作[63]。1936年，当《出关》被误会为攻击傅东华时，鲁迅指出这些误读正如十几年前人们解读《阿Q正传》那样，鲁迅并不否认小说写作有“模特儿”，但援引贾宝玉和马二先生为例，更强调艺术的再造：“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64]1935年为答文学社问，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一文中以一系列排除式的概念界定作了明确表达，就何谓“真实”而言，他看取的是“会有的实情”而非周作人所澄清的真实存在的原型。[65]这或可看作对于以“公心讽世”的创作实践的自我叙述。在鲁迅看来，人们对“讽刺”有一种“并不是美德”“不是文学上的正路”的“先入之见”[66]，但鲁迅更关切的是如何超越学术研究中的文类框架来实践作为艺术技法的“讽刺”，以这一能指去关联更深层次的所指。当1930年代小品文思潮流行之时，他强调讽刺与幽默本质上的区分[67]。另一方面，鲁迅也论及讽刺文学的作者与接受群体（他们很可能与“被讽刺者”有着阶层上的重叠）之间的关系：“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68]当剧作家将《阿Q

SAPIB.indd 76 2020-2-28 10:32:09

正传》改编为戏剧时，鲁迅最初就反对将未庄落实在绍兴，并为自己的写法作出解释：

> 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69]

对于读者，鲁迅有着自己的期待，虽然一直留心《阿Q正传》的评论，但“觉得能了解者不多”[70]，他的失落恰恰说明虽然“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71]，却未能在读者接受一端收效。通俗文学那种索隐式、消遣式的读法当然在鲁迅批评之列，而新的文坛未能抵达对其苦心的有效理解，或许是更令鲁迅所失望的。1925年为小说俄文译本作序时，鲁迅也曾述及希望通过刻画阿Q“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然诸多观念不一的阅读反馈与自己的理想有所龃龉[72]。

如果说周作人评论的功绩在于提升读者的鉴赏品格，鲁迅则希望进一步发扬严肃文学的能动作用，“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保持了三年的沉默之后，从1925年起至1936年，鲁迅曾多次、几乎是详尽地重复地言说着《阿Q正传》的人物描写手法、戏剧化的叙述方式，以及对结尾的安排，这样频繁的自我回顾与自我阐发不可谓不特殊，背后隐现的是鲁迅对于以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动性的呼唤，即养成新的读者并使之转换为改造世界的主体。

因此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于终章“大团圆”的辩护。周作人的评论中将“著者的失败的地方”归于结尾[73]，郑振铎对此也“不以为然”，称“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74]。郑振铎这篇1926年11月21日见刊的批评直接引发了鲁迅的回应，12月3日他撰文《〈阿Q正传〉的成因》，回忆称想收束连载时，编辑孙伏园却不赞成，因而趁着孙伏园离京的机会将小说完结，但鲁迅也强调自己对“大团圆”的处理实非“随意”，并以典型的杂文写法很快荡出笔去，以拼贴的即时新闻引入对当下“相类的事实”的历史记录[75]。一个个阿Q不断死去，这死亡与暴力的循环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大团圆”。与其说阿Q魂兮归来，勾连起文学书写与当代历史，不如说鲁迅更想要提醒读者反省小说中碎裂的“大团圆”结局为何有如此多“会有的实情”作脚注，因此不言而喻，是阿Q注释了历史，还是他的书写正是为阿Q这样微小却广大的存在而作的“正传”。

“大团圆”的叙事模式来自通俗文学的写作套路，阿Q的“大团圆”结局则是以冤屈如草芥地身死在看客如狼的眼光中而告终，通过标题与内容的间离，鲁迅营造了一种克制的反讽的艺术效果，达到了韩南所称道的“那种动人的悲悯”[76]。安敏成则注意到“他冷酷的反省最终扰乱了西方的小说模式，观察者确定的客观性与读者净化反应的圆满被双双打破”[77]。因此讨论《阿Q正传》结尾的处理方式时，周作人与郑振铎的误读或许在于仅以舶来的文学观念为标尺来丈量小说的价值，而未能考虑到鲁迅所采用的叙述方式也是跟他对本国读者的期待相关联的。许钦文就称《阿Q正传》的讽刺笔调“通俗化的程度可以说是很高的”，“适合了一般读者的脾胃”，并指出其目的是“要在迎合读者的心理中，改进读者的心理”[78]。

在通俗文学甚嚣尘上，新文学仍处于草创期的20世纪20年代初，尤其是经历了《狂人日记》发表时的寂寞境遇[79]之后，鲁迅选择从内部撬动积重难返的文学传统，从而挑战、改进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心理。最初连载版《阿Q正传》能即时地引发社会强烈的反馈，与小说的通俗化戏仿有直接的关系。正如罗果夫注意到的，《阿Q正传》“被写成像是模仿旧文学作品的规矩的形式”[80]，木山英雄也注意到《阿Q正传》“与感觉迟钝的古怪滑稽小丑的登场相关联而活用了旧章回小说式的形式，这与《狂人日记》的新文体相关的异常过敏的感觉比较，其关系看似相反而实为相似”[81]。茅盾称《呐喊》“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新”不仅仅体现在《狂人日记》式的在与文言的序相对照中引入白话写就的新式文体，也体现在《阿Q正传》式的将表面看起来“过时的文学形式”与“生活的新要求”相对照，通过叙述方式上的戏仿达到对旧文学形式的“破”与对新文学内核的“立”。换句话说，通过对普通读者接受度更高的

SAPIB.indd 77 2020-2-28 10:32:10

通俗笔调以及传统“讽刺小说”的双重戏拟，鲁迅抵达了对一种新的文学的塑造。

如果说“鲁迅的写作始终是在建立规范和反抗规范的难局中展开……种种对立持续地构成了事实上的为现代小说和现代文学‘立法’的辩证运动”[82]，那么对鲁迅作品的阅读、理解与阐释，实际上也在对抗的难局与辩证的运动中进行着。通过考察《阿Q正传》的文类接受与观念建构以及鲁迅试图超越文类以“开出反省的道路”的努力，透视出的正是新文学场域中创作者、阐释者、阅读者等多方博弈的历史景深。

---

[1] 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译，第1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2] 谭国棠、雁冰:《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

[3]“巴人”即鲁迅的秘密，此前已由周作人揭出。

[4] 吕兆棠、雁冰:《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11号，1922年11月。

[5] 参见陈平原《“新小说”类型理论》,《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安徽白话报》停刊时间未详，但自1908年10月第3期起，在“讽刺小说”的命名栏中至少发表了五篇小说。

[7] 见“短篇小说丛书广告”,《申报》1914年8月22日。

[8]《申报·自由谈》《礼拜六》《中华小说界》《消闲月刊》《益世报》《小说新报》等报刊上均有“讽刺小说”栏目。

[9] 见卓呆:《讽刺小说·配倪斯灵》,《七日谈》1945年第1期;《讽刺小说·桐宫宽》,《七日谈》1945年第2期等。

[10] 曹淑英:《“新小说”的兴起》，见米琳娜:《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伍晓明译，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晚清提倡者对“新小说”之文类构想，参阅夏晓虹《晚清“新小说”辨义》,《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11] 秋叶:《自由谈·讽刺画考》,《申报》1919年8月17日。

[12]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

[13] 鲁迅:《随感录（四三）》,《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随感录（四六）》,《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随感录（五三）》,《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

[14] 瘦蝶:《短篇小说投稿心理》,《申报》1912年9月24日。

[15] 小山:《枪炮声中之种种趣闻》,《申报》1915年12月11日。

[16] 见《申报》1920年9月11日广告“滑稽小说大观”。

[17] 梁启超:《告小说家（一）》,《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1期，1915年1月。

[18]《教育部咨禁荒唐小说》,《申报》1915年6月25日。

[19][26][75]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北新》（上海）第18期，1926年12月18日。

[20][22] 川岛:《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人民文学》1957年5月6日。

[21] 见周作人著，止庵编:《关于鲁迅》，第23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3]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8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24][69][71] 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49页，第150页，第1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5] 涵庐（高一涵）:《闲话》,《现代评论》第4卷第89期，1926年8月21日。

[27] 鲁迅:《孔乙己》,《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期。

[28] 陈平原:《小说叙事的两次转变——答黄子平问》,《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22页。

[29] 关于“黑幕小说”的影响，见范伯群:《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30] 周启明:《关于阿Q正传》,《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1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31] 此前见刊于《新青年》《新潮》《时事新报·学灯》的《狂人日记》等多篇小说均以“鲁迅”为名。

[32][73] 仲密:《阿Q正传》,《晨报副镌》1922年3月19日。

[33] 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第18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4] 王媛:《周作人论鲁迅“山灵的讽刺”》,《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35]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修订版）》，第36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36] 周作人:《文艺批评杂话》,《谈龙集》，第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SAPIB.indd 78 2020-2-28 10:32:10

[37]雁冰:《读〈呐喊〉》,《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1923年10月8日。
[38]方璧:《鲁迅论》,《小说月报》1927年第11期。
[39]西谛:《呐喊》,《文学周报》第251号，1926年11月。
[40]从予:《彷徨》,《一般》第1卷第3期，1926年11月。
[41]碧晖:《讽刺小说和儒林外史》,《论语》1935年第58期。
[42]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民心周报》1921年第1期。
[43]《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44]鲍国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钩沉》,《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
[45]参见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46]厨川白村:《文艺的进化》，朱希祖译,《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47][5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耿云志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适卷》，第89—90页，第9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8]1918年胡适就在“死文学”/“活文学”的对举中称赏《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不过尚未作出南北分类。见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
[49]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
[50]胡先骕:《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解放与改造》1920年第2卷第15号。胡还将《镜花缘》与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视作“中外讽刺小说之最相类者”，见胡先骕《文学的标准》,《学衡》第31号，1924年7月。
[52]胡惠生:《小说丛谈：讽刺寓言滑稽小说》,《俭德储蓄会会刊》第4卷第2期，1923年5月。
[53]茅盾:《谈我的研究》,《中学生》1936年第61期。
[54]鲁迅:《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28页。
[55]鲁迅:《220821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第430—431页。
[56]周启明:《关于阿Q正传》,《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1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57]鲍国华:《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进及其修改的学术史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
[58][6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28页,第230页。
[59]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王瑶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0]胡适:《官场现形记序》,《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39页，上海书店1980年版。
[6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5页。
[63]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时鲁迅不仅对“讽刺”作学理的分析，他也提醒课堂的听众,“好好利用”“这个方法”。见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来今雨轩》，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第10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4]鲁迅:《〈出关〉的关》,《作家》1936年第2号。
[65]鲁迅:《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杂文》月刊1935年9月。
[66][68]鲁迅:《论讽刺》,《文学》月刊第4卷第4号，1935年4月。
[67]何家干(鲁迅):《从讽刺到幽默》,《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7日。
[70]鲁迅:《致沈西苓信》，1936年7月19日。
[72]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语丝》1925年第31期。
[74]西谛:《呐喊》,《文学周报》第251号，1926年11月。
[76]韩南:《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第3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7]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姜涛译，第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78]许钦文:《抗战文学与〈阿Q正传〉》,《战时中学生》(月刊)第2卷第8期，1940年8月20日。
[79]见雁冰《读〈呐喊〉》,《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0月8日。
[80]罗果夫:《〈阿Q正传〉俄译本代序》,《苏联文艺》(上海)第26期,1947年2月。
[81]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赵京华译，第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2]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第16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高华鑫

SAPIB.indd 79 2020-2-28 10:32:11